毛泽东思维方式探析

何　天　齐

近几年来，许多文章谈到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广泛、深刻的历史大变革时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思维方式也要相应地变革。如同许多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也离不开对于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因此，探讨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有着巨大而深刻影响的毛泽东思维方式，对于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维方式蕴涵极为丰富，这里我们只能择取几个基本特点加以论述。

1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第一个基本特点是实际化。

所谓实际化的思维方式，就是思考一切问题都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沿着客观事物发展的轨道进行思维。当然，任何人的思维都不可能十分准确十分及时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毛泽东也不例外；但是，同别的许多人比较起来，毛泽东的思维，总是比较地接近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特别是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那些日子里。同古今中外的著名领袖人物相比，除了具有叱咤风云、藐视一切旧势力的气魄和胆略之外，毛泽东的特点是更具有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熟习和喜欢的实际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成为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最伟大的领袖。

稍微熟习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是毛泽东以他特有的伟大气魄和卓越的求实精神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当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内外敌人的强大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遭致惨重失败时，正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大战略思想。当会后中央领导人要他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①他随即去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说服农民起义军放弃了攻打城市的计划而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迈开了第一步。尔后，在极端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他又进行了系统周密的农村调查，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建党建军建政等一系列问题，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这一套思维和作法，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理论和作法有很大不同，因而遭到国内外和党内外不少人的指责和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当王明这一伙人从苏联回国夺取党中央的最高权力，特别是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后，很快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错误的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致使红军在长征途中一再受挫，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样一个党和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又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系统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使党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随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如

毋宁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那末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实际化思维方式为全党所掌握，从而使党完全成熟起来了。此后不过三四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②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体现这种精神的实际化思维方式，因而能够深刻地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实际有一种深情的迷恋。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徒步游历过湖南一些地方，考察地理民情，进行社会调查。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曾有机会去法国留学，而且他和蔡和森等同志为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费了不少心血，但他自己却不去法国。他认为，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对中国的实际还了解得不够，留在国内更有益处。③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央要他主管农民运动以后，更是积极地系统地从事农村调查。他在1931年2月为《寻乌调查》所写的前言中说："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他还深情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④以后他又做过"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象毛泽东这样对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达到入迷的程度，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极为罕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也是不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实际知识，他的思维总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毛泽东革命生涯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度过的，因而他对一切空话、大话、假话和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十分厌恶，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只能害人害己，祸国殃民。针对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尖锐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口号。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等著名原则。他还多次用三句话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说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讲过两个揭露主观主义的小故事。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期，有一位同志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不服气，硬说毛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位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孙子兵法》这部书。另一个是，一位同志刚到洛川，第二天就下了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完全答不上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进行过调查。⑤

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这样一些震聋发聩的口号和原则中，从他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和所讲的这样一些生动具体的小故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主观主义思维方式的荒谬可笑和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同时也可以具体地领悟到毛泽东实际化思维方式的特有风格。现在人们谈论思维方式的变革时，不是喜欢讲创造性、开拓型思维吗？毛泽东提出的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就是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伟大创举，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典范。而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吃透了中国的国情，则是这种思维的根本出发点和灵魂。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要求，离开了这一点而侈谈思维方式的变革，侈谈创造性、开拓性思维，必然会走上邪路。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实际化思维方式并不是纯客观主义，不是死板僵化的实际主义，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十分推崇列宁的话：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还说过：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是以"万变"对付蒋介石的"不变"。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关于思想的作用，毛泽东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比如在他主持和修改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就说过："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重要军事著作中，他一再指出：军事指挥员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毛泽东本人就是在中国这个舞台上，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之内，发挥了他极大的聪明才智，演出了有声有色、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戏剧。虽然还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研究过相对论和量子论（只在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中提到过相对论），由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也许不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主体性因素在人的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却十分重视和强调主体的作用，这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许多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中似乎也是不多见的。

毋庸讳言，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有过脱离实际情况而造成的失误。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起，他的这种失误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除了种种客观原因之外，从主观方面来讲，毛泽东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他的确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丰富的想象力和不向任何环境低头的坚强意志和个性，同时又有丰富的感情（比如他看戏极易进入角色，往往不能自已）。所有这些不能不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他所倡导的求实精神，而导致严重失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与此不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思维方式的主导方面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即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主观上还是自以为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2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群众化。

毛泽东的群众化思维方式是他所一贯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体现。翻开毛泽东著作，从思想内容到表达形式，都是有血有肉，简朴自然，通俗易懂，除了给人一种强烈的实际感和可行性以外，就是他想问题办事情处处注意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他的思想，因而极易为群众所理解，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出身于受剥削压迫最为深重的中国贫苦农村，他从小同广大的农民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他们的疾苦，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当他读了许多中国的旧小说以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帝王将相，圣贤君子，英雄豪杰，却没有他经常接触的耕田的农民？这个问题使他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明白了：原来那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半是一些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叫农民替他们劳动。……⑥少年毛泽东能够发现并初步认识这样的问题，说明他从小就具有同情被压迫人民，并要为他们说话办事的品质。前面所说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除了他认为了解中国实际更重要以外，也是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据他的老师徐特立回忆：毛泽东当时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广大工农群众。他认为任何革命若要成功，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由于有了这种认识，所以当徐老邀毛泽东一起去法国留学时，毛拒绝了邀请。从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把它们看得比个人出国留学、学习外国的经验和知识更为重要。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更加自觉地并且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对待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运用于中国，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⑦又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⑧他还常常用生动的譬喻和极其通俗的语言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比如他在江西兴国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时就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⑨他经常对党的干

部说：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⑩1942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总结我党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详尽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他还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使我党的群众路线上升为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理论上是这样说的，而且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而制订的，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除了思维的内容反映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以外，毛泽东表达思维的方式，他使用的语言也是群众化的。在他的谈话和著作中，中国老百姓所熟悉并且喜闻乐见的生动比喻、成语典故、民歌民谚、诗词曲赋、民间语汇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俯拾即是。例如，他曾经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浅显通俗的语言说明运动战的方针和我们战略战术的总原则。他说：什么战略战术，无非是这四句话。⑪他还常常用十个指头抓跳蚤的比喻说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策略思想。他说：用十个指头同时抓十个跳蚤不行，抓跳蚤的办法应该是用十个指头一次抓一个，一直抓下去。⑫他用"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和"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形容党八股，既刻画了党八股丑陋、干瘪的形象，又揭露了它的形而上学本质。他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的重要，用"相反相成"、"又是冤家又聚头"说明矛盾规律，用"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一系列人们熟悉的谚语典故说明对立面互相渗透和转化的道理。⑬等等，等等。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曾经号召人们"要用很大的气力"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模范。许多深邃的思想理论乃至艰深的哲理，经他一表述往往变得明白易懂，饶有风趣，使人印象深刻，甚至豁然开朗。语言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思想、传输信息的重要工具，是思维的构成要素。毛泽东非常熟悉并且运用自如的群众语言，乃是他的群众化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和组成要素。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的晚年严重脱离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他所倡导和坚持的群众化思维方式，因而一再出现严重失误。但从一些描写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纪实文学和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仍然非常希望如同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自由自在地接触群众，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呼声。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一是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二是由于某些不合理的具体制度和规定，把领袖人物同广大群众人为地隔离开来了。毛泽东为自己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接触群众而感到苦恼和悲愤，他在1970年12月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流露过这种心态。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⑭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曾经尖锐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又说："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可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改革某些不合时代潮流，也有悖于革命传统的具体制度（包括妨碍领导人接触群众的安全保卫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综上所述，一个实际化，一个群众化，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两个根本特点，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两个最重要法宝，也是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过去毛泽东经常讲到共产党靠什么吃饭的问题。他的说法是：一靠科学，靠实事求是；二靠人民，靠群众路线。⑮这个话今天仍然有效。我们仍然必须继承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光大。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且难免失败和垮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个别支持自由化的领导干部，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和"精英治国"，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这些"精英"既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又与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他们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肆意否定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根本抹杀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企图把在西方都已"陷入泥潭"的"精英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到80年代的中国。他们虽然口口声声侈谈"思维方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其实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反群众反实际的，根本不是什么"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只不过是早已破产了的唯心

主义和英雄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复活而已。

3

毛泽东的思维方式还有两个特点，就是政治化和一元化。一些文章已经提到，有的对此进行了批评和指责。

我认为，政治化可以说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这从他的著作和他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来。比如，他十分强调"政治挂帅"，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分析和解决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思想理论问题、文学艺术问题等等，几乎都是从政治情况和政治需要出发的，甚至同政治直接挂钩。他对许多方针政策的解释也是政治化的，如对"双百"方针的解释就是如此。他历来主张"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6]建国以后，他发动的历次学术和文艺批判，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直接就是政治斗争。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名为"文化"革命，实际上文化的成分很少，主要搞的是政治。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的思维方式确实具有严重的政治化倾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建国以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也是相当政治化的。由于这种政治主要指的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人们在精神上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因而对这种政治化思维方式提出怀疑，甚至批评指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那末应当说，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特别是建国以前，这种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具体执行和具体论述中出现过一些问题（如在江西抓"AB团"、在延安审干中出现的某些扩大化现象，以及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的某些不足），但总的方面是正确的、必要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连梁漱溟先生这样长期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者，面对新中国在阶级斗争中建立的现实，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问题是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那种政治化，这就不对了。应当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拨乱反正，转移工作重点，批判"左"的错误，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那末我们今天对政治化思维方式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要区别清楚。

一个是如果政治指的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基本上不能提倡政治化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它与"左"倾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我们再也不能象过去"左"倾错误时期那样，把思想认识问题、学术理论问题、文学艺术问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与阶级斗争挂钩，上纲为政治问题。当然，在有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文化、经济等等现象是与阶级斗争有联系的；但毕竟文化现象就是文化现象，经济现象就是经济现象，不应随意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也不要随意把文化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现象。这个基本思想必须坚持，决不能再回到阶级斗争扩大化上去。但是也要看到，在我们社会确实还存在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这种斗争还十分尖锐，国际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政治化思维方式，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举个例子来说，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个话，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可以说是非常政治化的了。在"左"倾错误时期它确实被滥用并且造成过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它是否多少也有些道理呢？特别是从这次波及全国的动乱和发生在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来看，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精英"，早在几年前就一直散布美化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在思想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是不是在为制造动乱和暴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工作呢？显然是这样。而恰恰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麻痹大意，造成了严重的失误，这是很值得反思的。所以，即使从阶级斗争的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对政治化思维方式今天也不能完全否定。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政治指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7]）那末，我们提倡考虑一切问题都要从这种政治出发，都要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对这种政治化思维方式不仅不应否定，而且还要大大发扬。现在出现的不少问题，恰恰是由于这方面讲得太少了。

至于一元化问题，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中也确实存在。比如：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的最精辟的思想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他强调并且善于抓中心抓关键和抓纲；在《矛盾论》中，他把这种工作和思维方法提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提出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思想，并指出：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此外，在哲学上，他一直不赞成把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并列，说这是"三元论"，而主张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都要"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⑱在政治理论上，他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看得高于一切，他说他最初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⑲后来，他又把千条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在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上，他赞成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⑳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中，一元化或者说一元论占有突出的地位。

对这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现在海内外人士多所指责，认为它不合时代潮流。但是，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或者肯定，仍然要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去分析对待。至于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则应当通过百家争鸣去解决。（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某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政治、经济、思想理论等方面鼓吹"多元化"，反对"一元化"，那是为了达到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目的，这同探讨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利弊得失是两码事）。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思想和工作方法曾经武装过几代革命者的头脑，在阶级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中确实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在局部地区（如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也取得过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曾一度沿用这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比如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结果都不理想，甚至遭到失败。当然，提出这类口号，制定这类政策，不仅是或者主要不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但不可否认同思维方式有关系。当事者根据革命战争年代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以为在建设问题上只要抓住中心和重点，集中力量发展粮食和钢铁，其他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事实证明，用这种简单化、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对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不成功的。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末如前所述，除了简单化、一元化以外，它同时又是一种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把它直接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打天下的办法来治天下，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违背了中国历来的"逆取顺守"原则，就是错误的了。

为什么抓住中心和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卓有成效，而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却显得不够，或者不完全适用了呢？这是因为，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比过去夺取政权的斗争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面对这种崭新的情况，不仅我们的路线政策要变，思维内容思想观念要变，而且思维方式和方法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时代，就难免偾事。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好比一幢房子或一座桥梁，我们要推倒它、破坏它，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条件下，不可能一下子整个地全部地将它推倒，只能选择要害部位，集中力量给以关键性的一击，才能把它推倒；但是，要建造一座桥梁或高楼大厦，却不可能只集中力量修建一点或者一部分（尽管这一点或这一部分是关键和要害），而是必须从整体出发，设计出图样，一点一滴、一砖一石地建造，否则就建不成。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特别是打仗，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全面地抵御敌人和从整体上消灭敌人，唯一正确有效的办法就是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政治上，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而与此相反的办法，就是分兵把守，消极防御，或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前一种方法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而后一种方法则是失败主义的策略。

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时代的前进，这种在革命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逐渐显得不够或者不完全适用了。毛泽东本人首先觉察到了这一点。他1949年3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提出了"弹钢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

琴'"。1956年，在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所谓"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他在讲话中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国家、集体和个人，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把重点与一般结合起来，经济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政治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具体谈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他甚至进一步尖锐指出：对发展重工业有一个"真想"、"假想"，想得厉害不厉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那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如果是"假想"发展重工业，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

毛泽东针对我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和即将开始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这些崭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过去所讲的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思维方式，显然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是对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方法的重大补充和发展。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思维惯性的作用，毛泽东并没有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论十大关系》等所提出的这些正确方针和思维方法，而是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原先的老路上去了。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于是就全民种粮；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于是就全民炼钢；政治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就全民搞"大批判"。其结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造成严重错误。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同思维内容比较起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大得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往往是某种思维内容陈旧了，消失了，但思维方式却保留着，人们又用它去思考新的事物。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存在。比如人们在认识和对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待"生产力标准"，对待发展商品经济，乃至对待改革等等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以对待"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例。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同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这"一个中心"的思想。但问题是，应当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这"一个中心"？是象过去那样，以为只要抓住这个中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便都会"迎刃而解"呢，还是在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就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仿照《论十大关系》的说法提出一个问题：你对搞好经济建设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是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你就不重视科技和教育，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采取具体措施真正落实科技与教育的"突出的战略地位"。回顾近几年出现的困难和失误，许多就是出在这个忽视教育、科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上。当然，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不仅是教育和科技，也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比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极端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用那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教育问题，而是必须用全面的综合的系统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指导现代化建设，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注释：

①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载《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
②⑰ 《邓小平文选》第303—304、149页。
③⑥ 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73、17—18页，并参见斯诺著《西行漫记》。
④⑲⑳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1、22、24页。
⑤ 参见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载《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⑦⑧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80、1045页。
⑨ 肖华：《激江两岸的春雷》（回忆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11日。
⑩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0页。
⑪ 《毛主席八篇著作哲学思想辅导》，198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版，第169页。
⑫ 参见斯特朗著：《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
⑬⑱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8、506页。
⑭ 斯诺：《漫长的革命》。
⑮ 参见《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93页、第4卷第1100页等。
⑯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0页。